

「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專輯

第4輯

當代文學史料

研究叢刊



第
4
輯

當代文學史料
研究叢刊

編輯顧問

林海音、齊邦媛、柏 楊
痲 弦、隱 地、劉兆祐(臺灣)
黃俊東、盧瑋鑾
黎活仁、李立明(香港)
鄭樹森、李又寧、鄭繼宗(美國)
許世旭(韓國)
楊松年(新加坡)

基本社員

秦賢次、張錦郎、陳信元、林煥彰
莊永明、莫 渝、林文寶、楊文雄
林明德、向 陽、邱各容、吳興文
應鳳凰、劉慧葵

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 第四輯

著 者：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
發 行 者：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
地 址：台北市鎮江街3號6樓
總 經 銷：業強出版社
電 話：(02)3627550 FAX：3622281
定 價：一九〇元
訂閱全年四輯六〇〇元
長期訂戶請利用郵政劃撥0743812-9業強出版社帳戶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

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 第四輯

「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專輯

「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籌備經過	記 者	1
讓前輩的學術思想啓發我們	馬 良 春	4
——「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開幕詞		
攜手共建中華文學史料學	林 其 錢	7
——在「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上的發言		
兩岸學人同堂切磋 攜手共議史料研究	胡 從 經	9
奇迹般的聚會	孫 紹 誼	
——記海峽兩岸文學史料研究者的首次	陳 福 康	11
會見交流		
關於建設新文學史料學的認識和設想	朱 金 順	13
興奮者言——參加「中華文學史料學研	盧 瑋 鑒	19
討會」後		
滬上匯同好，天涯若比鄰	邱 各 容	23
上海六日記	秦 賢 次	27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文學研究會」的成立經過	陳 福 康	35
關於《文學研究會會員錄》	劉 麟	37
香港主要期刊所載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研	黎 活 仁	49
究資料目錄(1988年1月—6月)		

台灣文學研究

1979~1988台灣文學研究論文資料索引(上)

吳穎文 87
湯淑敏

現代譯詩名家

一、郭沫若

莫渝 113

1988年台灣出版界概況

台北聯合報副刊選評

——文學新書 質的排行榜

119

純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新書概況

劉慧葵 127

爾雅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新書概況

楊宗潤 130

九歌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概況

陳素芳 132

洪範書店一九八八年出版概況

葉步榮 135

希代書版公司一九八八年新書概況

三墨 139

一九八八年台灣出版文學評論及文學史料書目

吳興文 143

一九八八年台灣暢銷書排行榜分析

鍾麗慧 151

一九八八年台灣文學出版現象考察

陳信元 159

一九八八年台灣詩壇事項

李敏勇 165

譯詩集錦

佛洛斯特「雪夜駐馬林畔」

莫渝 169

文學的台灣

台遊雜拾
師鄉重游瑣記

歐陽予倩 183
胡 治 均 189

1988年逝世的作家

胡山源(1897.9.16—1988.1.1)	秦 賢 次 193
陳企霞(1913.10.20—1988.1.16)	秦 賢 次 194
朱東潤(1896.12.6—1988.2.10)	秦 賢 次 195
葉聖陶(1894.10.28—1988.2.16)	秦 賢 次 196
沈從文(1902.12.28—1988.5.10)	秦 賢 次 197
蕭 軍(1907.7.3—1988.6.22)	秦 賢 次 198
阮毅成(1905.11.15—1988.7.28)	秦 賢 次 199
施明正(1935.12.15—1988.8.22)	莫 渝 200
唐 納(1914—1988.8.25)	秦 賢 次 201
師 陀(1910.4.19—1988.10.7)	應 鳳 凰 202
劉延陵(1894—1988.10.18)	秦 賢 次 203

「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籌備經過

記 者

一九八七年十月初，在成都舉行的魯迅研究現狀座談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馬良春先生，向與會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胡從經先生建議由中國社科院文研所和上海社科院文研所合作，在上海創辦一種刊載文學史料的專門刊物，內容以近、現代中國文學為主。前此於一九八四年，馬良春先生曾撰文提出過加強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的建議（文載一九八四年第十二期《文藝報》），並得到不少學者的關注和呼應。近年來，主張建立文學史料學，開展專題研究，促其科學發展的學者益多，呼聲益高。然而，文學史料研究的實際狀況，卻與衆多學者之心願不盡相符。缺憾之一，即是大陸目前專門的文學史料研究刊物為數甚少，且有不同程度的缺點和局限，實難盡如人意。正是為了補偏救弊，企圖推動文學史料研究工作進一步健康發展，馬良春先生提議創辦一種新的文學史料研究專刊。

胡從經先生返滬後，即向上海社科院文研所負責人彙報了馬良春先生的建議。上海方面同意合作，並確定胡先生和該所現代文學研究室副主任陳青生先生作為代表，參預此事的謀劃與籌備。

是年十月中旬，陳青生先生赴成都出席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第四屆代表大會暨抗戰文學研討會期間，向馬良春先生通報了上海方面的情況，並就刊物的有關事宜進一步交換了意見。商議結果，決定該刊定名為《中華文學史料》，先取叢刊形式，以後相機再改期刊，內容亦不拘囿於近、現代，而廣容博蓄從古至今，包括大陸、港台及海外異域的中華文學史料研究。此後，《中華文學史料》叢刊的籌備工作，便在北京、上海兩地付諸實施。

創辦《中華文學史料》叢刊，實際上又是為實現大陸許多文學史料研究者多年來希望成立「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之心願的先行準備。

按北京、上海一些學者的設想，該刊雖由京、滬兩家文研所創辦，一俟以後「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得以成立，立即可改隸學會，作為學會會刊。而無論要辦好《中華文學史料》叢刊，還是成立「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都非京、滬兩地部分學者之能力所及，均需得到全國各地包括海外同仁的大力支持與團結協作。這樣，在適當時間舉辦一次邀請各地學者參加，以切磋文學史料學理論建設，商議編辦刊物和醞釀成立學會為主要議題的「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便成為馬良春等先生所考慮的問題。

一九八八年五月上旬，胡從經、陳青生先生赴京會見馬良春等先生，在商討《中華文學史料》叢刊籌備工作的同時，正式商議了由中國社科院文研所和上海社科院文研所聯合舉辦「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之事。雙方的初步意見是：1. 考慮到會議經費的籌措困難和款額有限，研討會的規模不能太大，與會名額以四十人左右為宜；2. 研討會地點擬在京、滬兩地之外的物價較便宜，且交通較便利處選定；3. 為方便任教於高校的學者與會，研討會時間擬定八月間；4. 鑒於當前普遍緩和的國際及海峽形勢，考慮到更加有利於促進中華文學史料學發展之所需和海內外致力於中華文學史料之研究者的共同願望，為了促成各地各方面同仁的通力合作與交流，為了更有利於發掘和保存中華文學遺產及弘揚中華文化，研討會將積極邀請台灣、香港及海外其他地區的有關學者，為這些學者提供十位左右與會名額。

這之後，在馬良春先生主持下，研討會籌備工作主要分三方面著手進行。一方面，由馬良春先生負責爭取各有關方面的支持，籌措落實會議經費。另一方面，由胡從經先生負責與各地有關學者聯繫，包括徵詢港台等地同仁的與會可能。（這裡必須提到，與大陸以外有關學者的聯絡工作，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學盧瑋瑩女士的大力協助和台灣「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會」同仁的熱烈響應）。再一方面，則由陳青生先生物色會議地點，聯繫接待單位。

七月下旬，陳青生先生特往南京、煙台等地，考察選擇適宜的會議地點，爭取當地熱心人士和機構的協助與支持，並於八月初將考察情況報告北京，提請馬良春先生裁定。

八月中旬，馬先生函示上海，告月內及九月間將有數項要事留京處置，提議研討會延至十月間舉行。盧瑋瑩女士此時亦轉達港台學者

意見，建議會議地點定在上海，以便利港台學者往返。

八月底，經與中國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招待所接洽獲允接待研討會之後，胡從經、陳青生先生再赴北京，與馬良春、徐迺翔、裴效維、蔣守謙、何九任、楊鎌諸位先生會商，最終確定了研討會的經費、地點、時間及與會者邀請名單和會議的主要議程安排等事宜，並責成胡、陳二先生承擔會務工作。

胡、陳二先生返滬後，將北京之行的情況向上海社科院有關方面和文研所負責人做了彙報，同時向各地有關學者寄發與會邀請書。上海社科院特撥專款資助研討會。文研所副所長陳伯海先生亦對研討會會務工作給予周詳指導與安排。在諸多方面和人士的支持協助下，醞釀、籌備近一年之久的「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終於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一日順利召開。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一日「中華文學史料研討會」會前之台灣文學出版品展覽。

讓前輩的學術思想啓發我們

——「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開幕詞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

馬良春

「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現在開幕了。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大陸、台灣、香港五十餘位專家學者，共同研討史料學的建設問題，說它是學術有史以來的一件有意義的大事，我想是會被公認的。

從總體上議論「文學史料」，不是簡單的事情。隨著歲月的推移，留下的史料浩如煙海，治史者面前的史料繁複龐雜，真偽相摻。作為稱得上治史賴以立論的基石的史料，必然是歷史上客觀存在的，真實可靠的材料。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召開的這一次會議可說是爲了磋商探求歷史真實和如何探求歷史真實的會議。

我一直很讚賞馮友蘭先生的一個觀點，他認為歷史有「歷史」和「寫的歷史」之分。「歷史」只有一個，而「寫的歷史」會有很多很多，且未有兩個完全相同的。很顯然，馮先生所說的只有一個的「歷史」，是由確曾存在過的事物所構成，而「寫的歷史」則是後人對「歷史」的描述。由於修史者對確曾存在過的事物掌握的程度不同，也由於認識上的差異，出現很多的、「無有兩個完全相同」的「寫的歷史」，就在所難免了。儘管如此，「寫的歷史」之是否具有科學性，終究要受只有一個的「歷史」的檢驗的。修史者對真實的史料之追求是至關重要的。誠如梁啟超所說：治一學，第一步先將此學之真相了解明確，第二步乃批評其是非得失。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這裡所說的「真相」，即是真實可靠的史料，掌握「真相」是治史的前提，離開了前提也就失去了批評的權力。

近些年來，學術界在探求提高研究水平的路徑，各種宏論，各種實踐，無不給人以啓迪。但我在這裡要說的是，史料建設對於提高學術研究水平來說，是具有關鍵意義的問題。君不見，有多少論者或因史料掌握的貧乏，或因史料運用的失誤，或因忽視乃至將史料看成是

無用的東西，而使自己寫出的文章漏洞百出，空話連篇，毫無實際意義。基於理論著述存在的弊病，呼籲重視史料，加強史料學建設這是問題的一個方向；問題的另一方面還在於現有的史料工作的狀況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從近十年來看，史料書籍和史料性的文章日漸增多，但細究起來，差錯是不少的，勿庸諱言，這都和史料工作者的修養不夠有關。

「史料學」作為一門學問，在中國具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歷來熱衷於這門學問的大家，都從史學方法論的範疇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諸如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考據學，都可視為卓有成效的治學方法，毫無疑問，這些方法也應為我們今天從事史料工作的人所熟悉和掌握。從劉知幾的史家「三長」到章學誠的「四長」之法，都可謂為從事者樹立的嚴格條件，我們今天也應該用來要求自己。只有如此，才能使史料工作具有科學性和應用性，從而才能減少史料工作的差錯，避免為史料而史料，以至消融將史料與研究對立起來的弊端。

事實上，史料工作與理論探討和創新並不矛盾。就拿從漢人注經為開端，到清代大發展的考據學來說吧，就體現了一種創新的精神。對此，梁啟超有精闢地見解，他認為：學問之最大障礙物，莫過於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對象，照例是不許研究的，新學問發生的第一步是要將信仰的對象一變為研究對象。基於這一觀點，梁氏將明末清初以來的新思潮解釋為從懷疑「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到稍後的疑古、辨偽、考據之學，正是開了將數千年之儒家經典作為研究對象之風。由梁氏所見，我們簡直可以說，只要不是為了考據而考據，考據本身就是為了創新。

在當今引進和借鑒外國文學方法的熱潮中，我們對傳統的方法不能採取輕率的甚至鄙視的態度。因為傳統中有極可寶貴的足以使我們引以為榮的東西，繼承它會推進我們文學的發展，會幫助我們樹立嚴謹的學風和文風。梁啟超做過近三百年來的學術史考察，他的體會雖非鮮為人知，但在此特定的場合摘述幾點，與諸位共同品味，也許不算是多餘的。其一，他認為我國文化史確有研究價值，「我輩雖當一面盡量吸收外來之新文化，一面仍萬不可妄自菲薄，蔑棄其遺產。」其二，他在談到先輩的「學者的人格」時告誡人們「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要「性耿介」，「志專一」，「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

有此等人。」其三，學問之價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創獲，經一番研究，就有一番貢獻，「必如是始能謂之增加遺產。」其四，梁氏將當時的學風與前輩學風相比照，發現種種缺點，認為學問上籠統影響凌亂膚淺等等惡現象，非徹底改造，則學問永無獨立之望。

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和從事創作的人一樣，各有自己的方法和風格，在創作上，風格相近的人往往形成一個流派，在學術研究上，實際情形也如此。長期以來，在學術研究領域，始終有一批酷愛史料工作的人，無形中存在著一支隊伍。為了將史料學真正作為一門學問來研究，使史料建設走向科學化，更好地推動理論研究，加強史料工作者之間的聯繫，把大家組織起來是十分必要的。基於這種考慮，我在一九八四年寫的一篇專論中倡議成立史料學學會。幾年來，得到許多同行的讚同和支持。在同行們得知召開本次史料學研討會的時候，紛紛提議將醞釀成立學會作為本次會議的一項議程，我認為這個提議是應該肯定的。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於不久前聯合創辦的《中華文學史料叢刊》，其辦刊宗旨和刊物內容也將提請與會代表討論，如果將來「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能夠成立，那時會員們如果同意，這個刊物也可以成為學會會刊。

總之，首屆「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需要探討和協商的事情很多，會前代表們所表現出的熱情，足以使人深信，這次會議一定會取得預期的效果。

一九八八年十月



馬良春先生開幕致辭。

攜手共建中華文學史料學

——在「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上的發言

（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其銓

中國有句老話：「巧婦難爲無米之炊」。沒有文學史料，便沒有文學史；沒有文學資料的積累，也不可能有科學的文學研究。我想：這是不說自明的。

從中國的歷史看，史料工作可以說是源遠流長。《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這裡說的「文獻」，用現在的話說也就是史料。宋末馬端臨編著了一部著名的《文獻通考》，他給「文獻」下的定義是：「引古今史謂之文，參以臣僚奏疏諸儒議論謂之獻。」他已經給史料的內涵和外延作了界說。當然，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的發達，令人對史料的理解在內涵上更加豐富，外延也就更加寬廣。顧頡剛先生在民國十六年（1927年）爲廣東中山大學圖書館收購圖書資料時，就曾經編寫過一本題爲《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提出要「以能夠用了材料的觀念去看圖書，能夠用了搜集材料的觀念去看圖書館的事業」。並且具體擬訂了十六個方面內容十分廣泛的搜集中國圖書資料的計劃，在實際上把史料的範圍大大拓寬了。中華文學史料學，顧名思義，它是特指中國的、文學的史料工作的一般理論，而不是那種沒有特定對象的廣義史料學。所以，它同一般的文獻學是有區別的。

中華民族有重史、修史的傳統，史料工作發軔甚早，綿延數千年而不衰，不僅積累了浩如煙海的史料，也積累了搜集、鑒別、整理史料的豐富經驗，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史料工作理論和方法，甚至還有學派。今天社會已經進步，科學也已大大發達，諸如電腦處理等現代化手段也正日益普及。因此，只要我們運用科學的方法，對豐富的歷史經驗和實踐經驗進行梳耙、剔剝、整理和總結，使之系統化、理論化，便一定能夠建立一門新的學科：中華文學史料學。

中華文學史料學，應該能夠適用於古典文學史料，近、現代文學史料以及當代文學史料的搜集、鑑別、整理、編纂、流通和使用。中華文學史料學的建立，將使文學史料工作更加科學化，因而也必將使文學史料工作更加自覺和有效。所以我讚成有志於此道的同行，攜起手來，共同為創建中華文學史料學而努力。

兩岸學人同堂切磋 攜手共議史料研究

——首屆「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在滬召開

胡從經·孫紹誼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聯合發起召開，有海峽兩岸和香港等地學者40餘人參加的首屆「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10月11日至14日在滬召開，兩岸學人共同探討中華文學史料的研究問題。王元化、徐俊西、賈植芳、丁景唐、趙家璧等知名學者和有關方面領導到會講話。

台灣學者首次組團來大陸交流

在海峽兩岸交流日益頻繁之際，台灣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秦賢次、吳興文、邱各容諸先生和台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資料主編應鳳凰女士經過努力，首次獲准應邀飛抵上海，與大陸學人共同研討中華文學史料學的建設事宜，了其多年的夙願。

台灣學者為這次會議進行了充分的準備。秦賢次先生向會議提出了印刷精美的長篇論文《文學史料的出發與遠見》；邱各容先生分別就“大陸文學作品在台灣、台灣文學現狀”和“台灣兒童文學現狀”作了專題學術演講；吳興文先生則向會議提交了專題著述《最近一年來台灣文學出版概況》。台灣學者此次參會，還攜帶了大批台灣出版的文學書籍、刊物在開幕式期間展出，並無償贈送給「中華文學史料學會」籌備小組。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副所長陳伯海研究員說：“海峽兩岸學者對文學史料學的建設表現出共同的興趣、共同研討的願望，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為力促台灣學者來大陸交流起到“拼搏”作用的香港中文大學盧瑋靈女士等也在發言中表達了自己的激動心情。

史料科學亟待振興

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是探討文學史料學建設的意義。中國社會科

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馬良春在開幕詞中說，前人留下的史料，沒有無用的東西。史料的搜集研究關係到教學質量、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史料學自應有其重要地位。著名學者王元化教授稱讀清代乾嘉學派和日本學者治學謹嚴，重視史料，從資料入手進行研究的方法。與會代表一致指出，科學的學風必須建立在豐富和確鑿的史料基礎上，在當前理論界追求急功近利，輕視紮實的史料搜集、考據工作的浮躁學風有所抬頭之時，討論史料學學科的建設，是一次具有眼光的選擇，是頭腦清醒的作法，能對不正學風起到匡正作用。

會議還對文學史料學科的性質、特點、方法、研究對象和範圍等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北京大學孫玉石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朱金順副教授就這方面向會議分別提交了《史料建設與理論研究科學化問題隨想》和《關於建立新文學史料學的設想和建議》的發言。

建立史料研究隊伍，弘揚中華文化

這次研討會上，代表們正式確定出版《中華文學史料》叢刊。《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姜德明建議，擬出的刊物理論、方法研究的要有，史料本身更應有較大的比重。這本刊物要取得各地華人學者的支持，使其真正涵蓋華人文學地區，弘揚古老而獨特的中華文化。台灣學者秦賢次表示，他們除提供台灣地區文學史料學研究動態外，還設想在香港、新加坡、美國等地設置通訊員，使這份動態類通訊成為世界性的史料學研究的信息總彙。

會議最後動議，在明年適當的時候，正式成立「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以凝聚同好，推動文學史料學的建設和研究。（本文原刊於1988年10月20日，上海文學報）

奇迹般的聚會

——記海峽兩岸文學史料研究者的首次會見交流

（上海外國語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陳福康

剛剛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激動的心情尚未平靜。近年來，有幸參加過幾次全國性的學術會議，却從未有使我如此興奮者。這不僅是因為長期被某些人忽視乃至蔑視的文學史料工作，這次得到了如此理直氣壯的從理論、方法上所作的高層次探討，並醞釀、籌劃了同人嚮往多年的學會及學刊；更令人高興的是，聞名或神交多年的台灣及香港的同行也蒞臨了會議。

“這簡直是個奇迹！”香港中文大學的盧瑋靈女士喜不自禁地說。原來，台灣的新文學研究者，一直在資料條件相當困難的條件下工作着。就在去年年初，台北的七、八個中青年研究者以秦賢次先生為首，組織了第一個學術團體，定名為“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他們特地選了現代文學史上最早、最大的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正式成立的那一天——1月4日——舉行該社的成立大會。這是寄寓新意的。短短一年多來，他們已經自費出版了裝幀非常漂亮，內容也很精彩的《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共三輯，並通過香港的朋友輾轉傳入大陸，令內地同行們刮目相看。多年來，盧女士為海峽兩岸現代文學研究者的通信交流，默默地盡了橋樑作用。一、二個月前，她得悉上海將舉行這一研討會，便向台灣朋友作了通報。沒想到這麼快就實現了多年來連想也想不到的兩岸學者當面交流的盛會。

秦賢次先生今年45歲，是研究社的兄長。他的大名，此地讀書界也早就熟悉了。因為好幾年前，上海書店便曾翻印過他編的《郁達夫南洋隨筆》與《郁達夫抗戰文錄》二書，並很快就售罄了。他的名片上印着某保險公司經理的頭銜，研究現代文學是他的“業餘愛好”，但他以極大的心血注於文學史料工作，談吐間即可聽出他是很有研究的內行。學者風度翩然的秦先生告訴我們，他們的社員已發展到十幾位，